

烈山窑为宿州窑之初步考证

彭义池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烈山窑是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镇烈山西麓烧造陶瓷器的古代窑口。唐宋金时期，烈山窑属古宿州辖区内，且和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烈山窑近年来才进行考古发掘，故学界对其研究较少，而对于烈山窑是否为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研究均语焉不详。从行政区划、出土瓷器、时间范围、排除其他窑址、贸易范围、文献遗漏等六方面进行考证，初步可以判断烈山窑即为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

关键词：烈山窑；宿州窑；古窑考；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瓷窑考古工作进展越来越顺利，许多原本只存在于文献中的古窑址陆续被发掘发现，丰富了陶瓷学界有关古窑址及出土器物的研究。然而，对于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学界仍在作进一步探寻，由于宿州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学界对其仍存在很多疑问。关于宿州窑，最早记载即为南宋周煇的《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1]后世学者对宿州窑也多有提及，所述和周煇大致相同。如清乾隆、嘉庆年间成书的《景德镇陶录》记载：“宿州窑——宋代烧造，为今凤阳府之宿州也。器仿定色，当时行尚颇广。自定窑器减后，而北地且多市充定器，然固不及真定瓷也。”^[2]民国时期成书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记述：“宿州窑，在今安徽宿县，亦仿定器者，胎釉颇似北定，然终逊之。自定州窑减少以后，市多充定器。”^[3]民国时期成书的《饮流斋说瓷》中说：“仿定者曰‘吉州’、曰‘宿州’、曰‘泗州’。”^[4]《中国陶瓷史》记述：“宿州窑所出之器，完全仿定，色白，当时行销颇广。”^[5]综上，可见宿州窑在宋金时期的确存在且具有一定的烧造规模。尤其根据周煇所述，北方金人在某一时期所用瓷器多为宿、泗两窑仿造的定瓷，可见宿州窑瓷的畅销。因此，宿州窑应是宋金时期比较繁盛的一处窑址。多年来，陶瓷学界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探寻。烈山窑的考古发掘，为学界进一步探寻宿州窑址提供了新的线索和重要的实物资料。烈山窑址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烈山村，2017年9月，淮北市重点工程局在实施新湖路建设项目过程中发现烈山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3月组织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分为三个区域：I区金元窑址区域、II区唐代末期至北宋窑址区域、III区汉代窑址区。清理各类遗迹70余处，出土了以白瓷、青釉瓷、三彩器为主的大量遗物，产品主要包括碗、盘、盏、罐、建筑构件、黄釉印花砖等^[6]。

据已公开的考古发掘报告等相关资料和笔者初步考证，烈山窑很有可能就是周煇《清波杂志》所提到的“宿州窑”。由于资料所限，不能直接判断烈山窑即为宿州窑。因为宿州窑有无传世瓷器尚有待考证，现在所谓的宿州窑传世瓷器（如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金宿州窑莹白鎏式洗、宿州窑蒲槌瓶、金宿州窑莹白印花雷文鼎等），很多都是先认定为定瓷后改为宿州窑瓷，据《宋瓷笔记》：“故宫旧藏中，有一些原称定窑后被郭葆昌改定为吉州窑或宿州窑的白瓷制品，如‘金宿州窑莹白印花回纹蒲槌瓶’。”^[7]可见，这一批瓷器是否为宿州窑所产尚且不明，因此不能拿来直接和烈山窑瓷进行科技考古检测对比。故在此只能通过零星的文献记载、现有的考古资料来判断烈山窑是否为宿州窑。主要推论如下。

二、烈山窑为宿州窑之推论

（一）行政区划推断

首先，烈山窑所在地即今淮北市烈山区在唐代归宿州管辖，《旧唐书·地理志一·河南道》载：“宿州上，徐州之符离县也。元和四年（809年）正月敕，以徐州之符离置宿州。仍割徐州之蕲、泗州之虹。九年，又割亳州之临涣等三县属宿州。”^[8]北宋时期淮北地区仍属宿州，《宋史·地理志四·淮南东路》载：“宿州，上，符离郡……开宝五年（972年），建为保静军节度。……县四：符离、蕲、临涣、灵璧。”^[9]宋金对峙时，宿州归金管辖，淮北地区属南京路宿州防御县四之符离县、蕲县、临涣县^[10]。由此可见，唐宋金时期的淮北地区是在宿州管辖之下，那么淮北地区的烈山窑自然也属于宿州行政区划内。

其次，除周煊《清波杂志》提到宿州窑外，《景德镇陶录》也曾记载过“宿州窑”，并对其位置有大致描述。《景德镇陶录》载：“宿州窑，宋代烧造，为今凤阳府之宿州也。器仿定色，当时行尚颇广。自定窑减后，而北地且多充定器，然固不及真定瓷也。”^[11]按照《景德镇陶录》记载，宿州窑在凤阳府的宿州，也包括今烈山窑所在的淮北地区。

再次，据叶喆民和冯先铭两位学者的判断，宿州窑在安徽宿县。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对宿州窑的位置有所提及：“其他以仿定闻名而见诸文献的，还有安徽宿县的宿州窑、泗县的泗州窑……以上这些窑场，有的已经实地调查得到证实，有的则仍需做进一步的考古工作。”^[12]冯先铭也在《冯先铭谈宋元陶瓷》中提及宿州窑：“淮北地区金代也仿烧定窑瓷器，周煊《清波杂志》中几句简单记事，使我们得知安徽宿县和泗县附近有仿定的瓷窑，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宿州窑和泗州窑，这两个瓷窑目前还没有发现，今天只能从《清波杂志》中的‘色莹净可爱’五个字来了解。周煊把宿州两窑仿定窑器物描写为釉色莹润而洁净，引人喜爱，这类仿定瓷器是他在出使金朝时所见。因此北方地区金墓及遗址出土白瓷中，似应有宿州窑和泗州窑白瓷在内，由于窑址迄今未发现，还不认识两窑瓷器的庐山真面目，目前也难以解决。”^[13]可见，叶和冯两位学者都将宿州窑所在地定为安徽宿县。宿县存在时间为1912—1992年，是旧县名，范围包括今宿州市埇桥区全部、今淮北市相山区大部分、淮北市烈山区全部、今濉溪县全部、今蚌埠市固镇县一部分。而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烈山窑是目前此行政区划内最符合宿州窑特征的窑址。

此外，今安徽省宿州市辖萧县，也有大规模的窑址发现，即萧窑。萧窑是对萧县境内所有窑址的统称，其中以萧县白土镇窑和欧盘村窑面积最大，出土陶瓷器较多。萧窑遗址群位于萧县东南部，位置距离烈山窑较近。但据史料记载，萧县在宋金时期是徐州辖区，《宋史·地理志一·京东路》载：“徐州，大都督，彭城郡，武宁军节度……县五：彭城，沛，萧，滕，丰。”^[14]《金史·地理志中·山东西路》载：“徐州，下，武宁军节度使。宋彭城郡……县三、镇五：彭城，萧，丰。”^[15]冯先铭曾归纳瓷窑命名的几种原则有：“以地方命名、以经营性质命名、以方位命名、以姓氏命名。”^[16]而以瓷窑所属州县为名，是最普遍的一种命名法，如安徽寿州的寿州窑、江西景德镇的景德镇窑、湖南长沙的长沙窑等等。因此，按照瓷窑址命名多以州名为原则，宋金时期在宿州境内的烈山窑极有可能就是宿州窑。同样，根据这一命名原则，宋金时期在徐州境内的萧窑则不太可能用宿州窑命名，而极有可能用“徐州窑”或以“萧窑”命名。

综上，根据行政区划及常见窑口命名原则来看，烈山窑是目前古宿州境内最符合宿州窑特征的窑址。

（二）出土瓷器推断

根据烈山窑出土瓷器和周煊所描述的宿州窑瓷器，对比后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一，两窑生产的瓷器都仿定器。宿州窑是以仿定窑白瓷而出名的窑口，而烈山窑出土瓷器中也以白瓷为主。宿州窑白瓷能在北地以充定器，可见宿州窑白瓷的烧制技术和艺术特征都和定窑相仿，肯定受到了定窑的影响。而烈山窑也受定窑的影响较大，和定窑存在一些技艺交流。宋金时期定窑的装烧技术主要为覆烧和涩圈叠烧，覆烧还是定窑首先创造并影响较大的装烧工艺，这种覆烧技术由于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等优点，经定窑创造后很快普及到全国诸多窑口。烈山窑也深受定窑覆烧技术的影响，烈山窑址出土的北宋白釉瓷器就采用了覆烧技术，即将器物翻过来和垫圈、垫饼一起组合覆烧。而金代是定窑制瓷业最繁盛的时期，金代定窑的装烧工艺方面，除了使用支圈和匣钵组合覆烧的方法，粗化妆白瓷和少量的细白瓷采用涩圈叠烧^[17]。涩圈叠烧也是烈山窑金元时期常用的装烧方法，烈山窑虽不能烧制和定窑细白瓷一样精致的瓷器，但在装烧技术上和定窑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北宋时期的覆烧还是金元时期的涩圈叠烧，都受到定窑的影响。

此外，据有关学者科技检测发现，定窑和烈山窑在釉料配方上也有相似之处。定窑和烈山窑都在高铝质黏土中加入一定量的滑石，增加釉层中氧化镁和氧化钙的含量，使其降低釉的熔融温度，提高釉面质量，烈山窑受定窑影响继承了定窑的釉料配方又兼具自身特征^[18]。

其二，两窑生产瓷器质量皆较为粗糙。据周焯记载，定瓷“色莹净可爱”，但北方地区近年所用的瓷器，他一眼便能看出是宿、泗所出，并不是真正的定器。可见宿州窑仿定瓷中多为质粗者。这也是《饮流斋说瓷》中所说的：“此仿定者曰吉州、曰宿州、曰泗州。总之宋代杂窑，不外取法诸大窑，辗转仿效，其佳者每致乱真，而胎质、釉汁之精粗，明眼人不难判别也。”^[19]烈山窑出土的宋金白瓷，多为胎质较粗、质量较低的化妆白瓷。从仿定瓷质量不高这一点看，两者相似之处极多。

其三，烈山窑金元窑址区出土过带有“宿”字的白釉残片（图一）^[20]。残片上残留墨书“宿”字的三分之一，残片上的“宿”字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这里的“宿”指的是“宿州”。前文已述，淮北烈山窑所在地在宋金时期归宿州管辖。故这里的“宿”字很可能指的是烈山窑所在的行政区划“宿州”。第二，这里的“宿”指的就是宿州窑。残片上的“宿”字很可能就是窑工标记的窑名，以此作为款识。据有关学者归纳，瓷器上的款识类题记包括标记窑名^[21]。综上，烈山窑很可能就是古籍中所记载的宿州窑。



图一//“宿”字白釉残片 T0404(1)：6

（图片来源：《淮北烈山窑址》（上），第 335 页）

（三）时间范围判断

烈山窑经考古发掘分为三个区域，即汉代窑址区、唐宋窑址区和金元窑址区。因此，其烧造陶瓷器的历史大概可推测为东汉、唐宋至元，其中出土的宋金陶瓷器数量较多且比较精美，可判断宋金时期是烈山窑发展的鼎盛时期。而据周焯记载可知，宿州窑大约也是在宋金时期发展迅速，才能在金统治区域内以充定器。且据学者推论，一直到元朝时期，宿州窑还在继续生产陶瓷器，即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瓷窑为当地人民生活需要或外贸需要而生产各具特色的产品，如北方安徽宿州窑、山西平定窑的仿定白瓷^[22]。从这一点判断，烈山窑烧造历史及鼎盛时期和宿州窑烧造历史及鼎盛时期时间大致相当。宿州窑在宋金时期已进入繁盛期，那么其烧造历史应早于宋，按照时间范围来看，宿州窑和烈山窑烧造瓷器的历史也有较多的重合之处。

（四）排除其他窑址

目前在古宿州境内，除已发现的烈山窑外，还有一处曹村窑址。此窑址位于宿州市曹村镇后望庄、下庄芦花湖两处地点，窑址年代为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23]。曹村窑在隋唐时期就已停烧，因此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可以排除曹村窑址为宿州窑的可能。除曹村窑外，古宿州境内暂未发现其他宋金时期的窑址。

除曹村窑外，古徐州境内的萧窑因与烈山窑地理位置相近，也有学者认为萧窑也可能为宿州窑。前文已从行政区划排除萧窑为宿州窑的可能，而从萧窑早期瓷器和文献记载来看，则可以进一步推论萧窑并非宿州窑。第一，萧窑“创烧于隋代甚至更早，终烧于元代”^[24]。萧窑在隋唐时期与寿州窑关系紧密，生产器物中很多为仿寿州窑瓷^[25]。而目前关于宿州窑的文献记载中均未曾提及宿州窑有仿寿州窑黄瓷这一特点。第二，有关萧窑之名在古籍文献中也早有提及，如《夷坚志》和《景德镇陶录》。南宋《夷坚志》载：“邹氏世为兖人，至于师孟，徙居徐州萧县之北白土镇，为白器窑户总首。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人。”^[26]《夷坚志》为南宋洪迈所撰，据查，《清波杂志》作者周煇和洪迈乃同时代同时期之人，而当时宿州窑正名声在外。如萧县白土镇窑口确为宿州窑，那么洪迈应会在此卷中有所提及。而在此卷中，故事名为“萧县陶匠”而不是“宿州窑陶匠”，据此，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此外，《景德镇陶录》中也将萧窑和宿州窑单独提及，而并未混为一谈。有关萧窑，目前学者仍在持续考古调查研究中。根据宋金时期萧窑出土瓷器也有仿定器的特点，笔者认为宋金时期的萧窑可能和宿州窑（烈山窑）相互影响，或是属于宿州窑系的窑口。

（五）贸易范围判断

根据周煇的记载，他看到北地“定瓷”乃宿、泗地区所出，不是真正的定器。这一记载给后世遗留了一条信息，就是宿州窑生产规模较大，其生产的陶瓷器在金统治辖区内十分畅销，故才能如《景德镇陶录》所说“市充定器”。那么宿州窑的贸易应该很兴盛，其窑址所在地肯定是一处交通便利之地。而烈山窑也符合这一特征。烈山窑位于通济渠的支流雷河岸边、南北交通枢纽之地，且在淮北百善镇柳孜运河遗址中出土有宋金时期烈山窑的陶瓷器^[27]。宋金对峙时期，隋唐大运河还未完全废弃，故可以推测烈山窑陶瓷器在宋金时期是可以沿着通济渠、永济渠向北贸易的，交通较为便利，也就满足周煇所看到的“近年所用宿、泗近处所出”的现象。

（六）文献遗漏判断

烈山窑出土陶瓷器中既有日用陶瓷器，也有等级较高的精美陶瓷器，如龙纹枕和黄釉琉璃印花大砖。其中唐宋窑址区出土的黄釉琉璃印花大砖在考古发掘中是较为少见的。其特征为：近似正方形，一面施黄釉，饰花卉纹。灰色胎，较粗糙（图二）^[27]。据相关学者介绍，这种印花大砖也是开封祐国寺塔上最常见的建筑材料^[28]。更为巧合的是，开封祐国寺铁塔的琉璃砖上曾发现有“宿州土主吴靖”字样（图三）。这就说明宿州地区曾经有窑口烧制过琉璃砖等建筑构件并运输到开封作为铁塔的建筑材料。虽然祐国寺塔经过多次翻修，明朝时甚至更换补配过部分琉璃砖。但据学者考证，通过对比，祐国寺塔上的宋、明琉璃砖有各自的特征。“宋代琉璃砖瓦胎质为粗瓷土，色较红，质地坚硬，施釉绿、褐色釉，总体来说色泽较深，釉层厚重；明代琉璃砖多有模制印文，纪年较明确，胎质较细且色浅偏黄。”^[30]根据特征判断，印有“宿州土主吴靖”字样的琉璃砖为色较红的褐釉，应该为宋代的琉璃砖。而在宋代宿州境内的烈山窑也烧制这种胎质较粗的褐釉琉璃砖，且烈山窑位于通济渠的支流雷河岸边，具有将琉璃砖运送到开封的交通条件。因此，烈山窑可能是为北宋皇家寺院提供琉璃建筑构件的一处民窑，这样的窑址在当时应是较为重要的。如此，当时的文物笔记中像单纯仿定器的宿州窑都有记载，那烈山窑这样的窑址应该也会有窑址名称被记载或被提及。但笔者经查阅整理相关文献，却未曾发现古文献中有关于淮北地区有其他古窑的记载。当然，烈山窑是今人根据行政区划命名的。但这是否也可推论，其实烈山窑即是宿州窑，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有关宿州地区文献中没有记载烈山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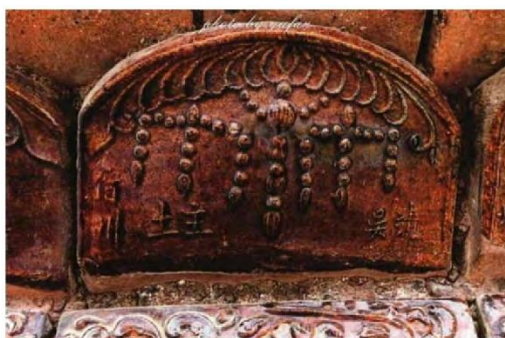


图二//黄釉印花砖 17 II TG4(4) : 46

(图片来源:《淮北烈山窑址》(上),第 231 页)

(七) 其他推论

以上考证均是依据古籍记载进行的较为合理的推论,故推论中未采纳学界某些关于宿州窑常见的表述。比如有很多学者都提到宿州窑和泗州窑的地理位置在萧县的南面与东南面,与萧窑接壤并存。如《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中说:“宿州窑和泗州窑,窑址在安徽萧县的南面和东南面,与萧窑接壤并存。”^[31]《中国的瓷器》中记述:“金代宿州窑和泗州窑,窑址分别在今安徽肖县的南面和东南面。此二窑与肖窑接壤并存。”^[32]然而,这一点在《清波杂志》等古籍文献中并未提到,应是后人所推论。不过即使这一记述为真,烈山窑也大致符合宿州窑的地理位置。烈山窑大致位于萧县的偏西南方向,与萧县白土窑地理位置接近,且淮北与萧县接壤并存。但由于这一推论未找到史料依据,因此本文未作详述。其二,也有很多学者提及宋金对峙时期,因中原地区的窑工很多学者提及宋金对峙时期,因中原地区的窑工大量南逃,故宿州窑产品也具有中原地区磁州窑产品的风格。如有学者说安徽地区的宿州窑、泗州窑、肖窑三窑所烧瓷器具有中原地区定窑和磁州窑产品的风格,属于瓷器贸易地区就近仿制热点商品而形成的窑场^[33]。《安徽科学技术》一书中也记述:“这样看来,萧窑、宿窑、泗窑应同为金代徐淮地区的三大窑场。史书记载靖康之变后,中原地区的窑工大量南逃,因此金代这三座瓷窑的产品具有中原地区定窑和磁州窑产品的风格。”^[34]《中国艺术图典》中也记述:“金人入关后,徐淮地区成为其统治区。靖康之变后,中原大批窑工为躲避战乱逃至淮河流域宿泗地区,在此重操旧业,将定窑、磁州窑的先进工艺带到这里,使萧、宿、泗三窑得到发展,并闻名于世。”^[35]对于宿州窑产品具有磁州窑风格,没有古籍文献作为依托,故在本文推论中也采纳。然而,如果这一推论属实,那么烈山窑也符合这一特征。因为烈山窑出土的金代陶瓷器中,有很多仿磁州窑风格的白釉黑褐彩瓷器,且根据科技考古检测对比,烈山窑在胎釉配方、装烧技术上也继承了磁州窑,和磁州窑存在密切的技术交流。



图三//“宿州土主吴靖”字样琉璃砖

（图片来源：陈超《淮北市烈山窑址出土文物浅析》，《文物天地》2019年第7期）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行政区划、出土瓷器、时间范围等六方面初步考证，宿州窑和烈山窑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笔者的结论如下：种种迹象表明，烈山窑应该就是古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宿州窑。烈山窑出土陶瓷器种类十分丰富，烧造技术也较为成熟，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考证烈山窑即为文献中记载的宿州窑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一，通过论证烈山窑即为宿州窑，可以完善皖北地区包括萧窑在内的古陶瓷体系；第二，通过论证烈山窑（宿州窑）的重要地位，可对烈山窑陶瓷器的行销、宋金对峙时期淮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探究；第三，烈山窑也是北方制瓷技术南传的一个实例，烈山窑仿定和仿磁州窑风格瓷器的出土，证明宋金时期北方窑系的制瓷技术对南北交接处的宿州地区窑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四，对宿州窑的进一步考证，有利于对中国古代古窑口的发展演变、文化内涵等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

由于史料匮乏、记载零星，宿州窑的全貌还难以完整地呈现出来。但对宿州窑每一次有意义的推论和探索，都会往前推进一步，也使学界离真相又近了一步。

参考文献

- [1] 宋·周焯撰：《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 [2] 清·蓝浦撰、傅振伦注：《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 [3]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6-17页。
- [4] 许之衡著、叶喆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 [5]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淮北烈山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 [7] 刘涛：《宋瓷笔记》，三联书店2014年，第27-28页。
- [8] 后晋·刘昫撰、廉湘民标点：《旧唐书》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448页。
- [9]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2179页。
- [10]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十五，中华书局2013年，第598页。
- [11] 同[2]，第93页。
- [12]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三联书店2011年，第407页。
- [13] 冯先铭：《冯先铭谈宋元陶瓷》，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
- [14] 同[9], 卷八十五, 第 2110 页。
- [15] 同[10], 卷二十五, 第 614 页。
- [16] 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 年第 5 期。
- [17] 秦大树、高美京、李鑫:《定窑洞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考古》2014 年第 3 期。
- [18] 桑月侠、郑乃章、吴军明:《论北方窑系对淮北烈山窑瓷器胎釉组成的影响》,《中国陶瓷》2021 年第 6 期。
- [19] 同[4], 第 40 页。
- [2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文物局、淮北市博物馆编著:《淮北烈山窑址》,文物出版社 2022 年,第 335 页。
- [21] 孙彦:《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第 10 页。
- [22] 叶佩兰:《元代瓷器》,九州出版社 1998 年,第 298 页。
- [23] 刘东:《安徽淮河流域古代窑业技术初探》,《安徽文博》(第 15 辑),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 [24] 陈超:《安徽萧县萧窑遗址群 2014 年田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 年第 6 期。
- [25] 吉帅:《浅析南北制瓷格局对萧窑瓷器的影响》,《陶瓷研究》2019 年第 4 期。
- [26] 南宋·洪迈:《夷坚志》(下),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8 年,第 1498 页。
- [2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淮北市博物馆编:《淮北柳孜一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93 页。
- [28] 同[20], 第 231 页。
- [29] 陈超:《淮北市烈山窑址出土文物浅析》,《文物天地》2019 年第 7 期。
- [30] 张武军:《开封祐国寺塔建筑分析》,《中原文物》2013 年第 3 期。
- [31] 李修松主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 2001 年,第 260 页。
- [32] 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编著:《中国的瓷器》,轻工业出版社 1963 年,第 181 页。
- [33] 杨桂梅、张润平:《中国瓷器简明读本》,新华出版社 2016 年,第 90 页。
- [34] 孔令刚主编:《安徽科学技术》,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第 185 页。
- [35]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编:《中国艺术史图典·陶瓷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 年,第 218 页。